

翻译家戈宝权研评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 广州 510420)

提 要: 戈宝权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 文学翻译史、外国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和比较文学研究专家。译介研究外国文学近 60 年, 著译作品近 200 篇/部, 获国内外各种荣誉几十项, 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

关键词: 翻译家; 戈宝权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 生平简介

戈宝权, 1913 年 2 月 15 日生于江苏东台, 曾用笔名葆荃、北泉、北辰、苏牧等。上过高小, 读过师范, 1928 年进入上海大厦大学经济系, 习过英语、法语和日语, 自学世界语。1930 年肄业, 进入上海《时事新报》任编辑。1932 年初受叔父鼓励开始学习俄语, 1935—1937 年, 任天津《大公报》驻莫斯科记者。七七事变爆发, 毅然回国参战。1938 年抵武汉, 任《新华日报》编辑。1941 年皖南事变后, 受周恩来派遣, 赴香港协助叶以群创办文艺通讯社, 1942 年回重庆任《新华日报》编辑, 兼任《新生周刊》、《世界知识》、《申报周刊》特约通讯员。抗战胜利后, 被派往上海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一报一刊, 后进塔斯社工作, 负责编辑《苏联文艺》; 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中苏文化协会理事及该会编译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委员、《中苏文化》和《文学月报》编委等。1946—1948 年任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编辑。

1949 年 3 月进京, 3 月 25 日作为中苏友协负责人参加北京西苑机场阅兵式。4 月参加布拉格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7—8 月应斯大林之邀随刘少奇秘访苏联, 后任新华通讯社驻苏记者。新中国成立后, 由周恩来任命, 任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派往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1949 年起, 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大会代表, 当选第四届全国委员。1954 年 7 月回国, 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1956 年列席中共八大, 负责接待苏共参加八大的代表团。

1957 年 11 月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1959 年, 该所成立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 他兼任组长; 1961 年初, 正式调入文学所工作, 刚报到, 就被派参加河北新城张八屯村整风整社运动。“文革”中受冲击。1977 年 5 月,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8 年他恢复工作, 担任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和东欧文学研究室主任。

自 1930 年代起, 他开始翻译和研究俄苏文学, 近 60 年来, 译过苏东欧和亚非拉各国文学作品不下于 90 篇; 发表译介俄苏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等的文章 35 篇以上; 译著(含合译)不下于 45 部, 有关外国文学的著作 10 部以上, 共计 500 余万字。参加编辑和注释《鲁迅全集》《茅盾全集》《郭沫若全集》等, 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先后获得许多国际荣誉称号: 1983 年苏联作家协会在“国际苏联文学翻译家”会议上授予他“为了多年来从事苏联文学翻译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荣誉奖状; 1987 年 2 月荣获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授

予的名誉博士，3月荣获苏联莫斯科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同年苏联文学基金会在普希金诗歌节上授予他“普希金文学奖”；1988年3月1日荣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同年被推选为苏联艺术学院外籍名誉院士，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作家协会授予他“文学翻译奖”，乌克兰作家协会授予他“伊万·弗兰科文学奖”，2000年2月荣获罗马尼亚国家授予的“荣誉奖”。先后被收入苏联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和《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乌克兰的《乌克兰大百科全书》和《谢甫琴科辞典》、日本的《现代中国名人辞典》和《中国新文学辞典》、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名人词典》和《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等。

他先后兼任过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中国茅盾研究学会的顾问，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及中国三S学会理事，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等，兼任《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译文》、《译林》、《世界儿童》、《阴山学刊》等刊的顾问、编委等，任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新疆大学等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名誉教授、兼职教授和学术顾问。因其工作业绩突出，1988年《普希金诗集》荣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1989年9月荣获香港翻译学会授予的荣誉会士衔，1993年《普希金诗集》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1994年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荣誉奖，1999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成立50周年，该会给他颁发了“中苏友好”纪念章。被收入《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中国现代文学辞典》、《外国文学手册》、《比较文学年鉴》、《中国翻译词典》、《中国翻译家辞典》、《民国人物大辞典》、《20世纪中国名人辞典》、《中国当代艺术名人辞典》、《中国当代知名学者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人物志》、《世界华人文化名人传略》等。

1981年离休，仍孜孜不倦，直至病终。

2 文学翻译实践

戈宝权早年就读经济系，后来转向文学，1932年进入报界后，继续大学时代已开始的翻译与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外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绝大部分译作是文学翻译。其文学翻译实践特点如下。

2.1 类型由少到多

戈宝权译得最早的是苏联作品，其他国家的作品由俄语转译，随着语种接触和国际交流的增多，他开始翻译其他国家的作品，涉及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塔吉克、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十余个国家，如他应乌克兰作家的要求，直接用乌克兰语译谢甫琴科的诗歌。除去文革十年，译作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1980年代最丰，这与历史进程相关，也与其人生历程和身体状况有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苏联，介绍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颇多，1980年代恰逢改革开放，翻译浪潮再起，戈宝权又成了弄潮儿，立在了苏东文学译介的中流。

2.2 既分散也集中

戈宝权的翻译对象主要是俄语国家的作家。据不完全统计，他前后翻译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哈萨克、吉尔吉斯、立陶宛等国家几十位作家的作品，例如，普希金、别尔戈莉茨、勃洛克、勃留索夫、戈洛杰茨基、高尔基、江布尔·扎巴耶夫、伊萨克扬、伊萨科夫斯基、库帕拉、马尔夏克、莫里茨、普沙米拉、西蒙诺夫、苏尔科夫、吉洪诺夫、魏里奇科、日丹诺夫、顾尔布坦、巴若夫、拉·西理奇、屠格涅夫、谢甫琴科、爱伦堡、弗兰科、鲁达基、唐克、米吉安民、柯涅楚克、狄青纳、马雅可夫斯基、吉亚泰、恰奇、米凯亚、托康巴耶夫、雅沃罗夫、安哥拉、马尔塞林诺·多斯·桑托

斯、拉扎尔·西理奇、德拉戈·西理奇、恰佑比、爱明内斯库、裴多菲，等等。戈宝权并没有均衡使力，众多外国作家之中，他集中笔墨译介的有普希金的诗歌、高尔基的小说与论文、爱伦堡的报告文学等。

2.3 由单篇到结集

这也是翻译常规。他起初译某个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发表，量逐渐增加，再出其选集或全集，译介由单篇到全面。比如，早期译爱伦堡报告文学，1930年代陆续刊于《新华日报》等，1942年由建华出版社结集为《不是战争的战争》。

2.4 体裁多有侧重

戈宝权早期翻译的是比较真实的报告文学，如爱伦堡的《不是战争的战争》、《6月在顿河》等，还有理论文献，如《普式庚与戏剧艺术》、《论普式庚》、《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等，后来才是文学性更强的作品，如诗歌、散文、小说等。前后翻译过的体裁有报告文学、文艺理论、诗歌、小说、散文、童话、寓言等近10种。

3 汉译精益求精

戈宝权慎重从译，其精益求精的典范是多次改译《海燕》。进入1980年代，他开始总结翻译经验，其研究源于翻译实践，翻译什么，就研究什么，或有什么材料就研究什么，无高谈阔论，只有材料和恰当的论述。他不曾以论代史，而是发掘材料加以简要分析，结论简洁。不过，其翻译仍有可商榷之处，讨论其译依然是本着他所遵循的精益求精的原则。

3.1 汉译典范：《海燕》

戈宝权译的高尔基《海燕》即使在“文革”期间，仍然被收入部分省市的自编教材，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从195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约他重译《海燕》作为高中语文教材到198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印全国通用中学语文课本，《海燕》前后修改了5次，堪称译界典范。5次修改是：1959年第一次重译，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课本；1964年第二次修订，为1964—1978年间全国各地中学语文课本采用；1973年第三次修订，辽宁省中学试用课本采用；1975年第四次修订，刊于华中师范学院主办的《语文函授》第5期；1978年第五次修订，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通用中学语文课本。

仅对照1978年与1975年的两个译本，发现不足千字16节的短篇，新译改动之处（包括词序、选词和标点等），达60处之上，可见译者精益求精的态度。最典型的是一字之易背后的道理。例如：

Он кричит, и — тучи слышат радость в смелом крике птицы.

1959年原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到了欢乐。

1978年改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

Силу гнева, пламя страсти и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победе слышат тучи в этом крике.

1959年原译：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到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1964年改译：在这叫喊声里，乌云感到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1978年改译：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关于这两处的修改，戈宝权（1978）有明确的说明：

这里两处“听到”，在俄文都是“слышат”（听见、听清、听到）。有些教师来信说“听到”这两个字有语病，“欢乐”等等不能“听到”，只能“感到”，因此为了教学起见，我在一九六四年修改译文时，曾把第一个“听到”保留住，而把第二个“听到”改成“感到”。这次重新修改时，经反复研究，又把两处“听到”都改成“听出”，因为“听出”两字既能表达原意，易于理解，也合乎我们通常口语中所说的：“从你的讲话里听出了问题”，“从你的讲话里听出了文章”等等。

改与不改，迥然不同。听到的是声音，用耳；弦外之音要听出，用心。二字之变，意境全出，诗意盎然。

戈宝权在追求神似与形似二者统一方面为译界树立了典范，得到了学界的公认，如董史良（1988）的评价：“凡是对照原文读过戈老译的《海燕》，都不难发现，它无论在语言形式上，或是在语言描述所传递的信息方面，均与原作极为相称，戈老的译文与原文的遗词造句异常接近，经得起与原文字字核对，但读起来毫无造作、晦涩之感。译作文笔通达流畅，却又保存着原作固有浓厚的意味。他的翻译决不背离原文，而是紧紧依据原作中语言描述的显象结构所获得的形象感受进行再创作。”

3.2 戈宝权的翻译观

戈宝权属于严复式翻译家，即重翻译实践，无暇顾及译论研究，从切身体会谈翻译。从译近 50 年后的 1983 年写了《漫谈译事难》，刊于《译林》，1984 年收入《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文章无新奇流行术语，所谈平淡实在，以饱蘸的译笔写出译之真谛。他谦虚地说：

我虽然从事翻译工作也有好多年，但我对翻译问题并没有作过什么理论上的研究，更谈不上总结出了什么经验。如果要我讲讲自己的体会，那我就只能讲出三个字：“译事难”！

戈宝权的“译事难”有别于严复的三字经，是另一种“三难”：

一难于严谨。“翻译是一件严谨的工作，它并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只要懂得一种外语，再依靠一部好的字典，就能把任何东西都翻译出来。”比如译高尔基《海燕》，他对《海燕》写出的历史条件、沙皇当局“漏审的疏忽”的过程、发表后列宁和苏联老一辈革命家的评价、拟人化手法的运用等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赞同国外翻译家和文艺批评家的观点：严谨的译者应力求保全原文的内容与形式，反对改变作品体裁的做法，如把诗歌译成散文等。

二难于杂学。根据大半生的实践，他切身体会到“一个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艰苦，决不是读者从译文的字里行间所能感觉得到的”，“一个翻译工作者所具有的常识和文学修养毕竟是有限的，但在他翻译的作品中所包容的知识却又是无限的，这就要求译者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多方面的知识。”

三难于词义。有关普通与专名词义的翻译，他感触最深，可归为“五小难”。一曰避免误译难：一字一词的误译，危及全文意义，有时实属难免；二曰翻译出典难：文学和社科作品用典多，不加注，读者难以理解，而译典，则要考典，有时颇费周折；三曰译人名难：各国人名读法不尽相同，不能一律套用英文发音，否则容易出错，方法是多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音表》和各种语言的《姓名译名手册》；四曰译书名难：译外国书名，译名不参考内容，容易译错；五曰翻译事物名称难：外国建筑、家具、服装、车辆、饭菜、酒类等名称都比较难译，必须了解国情才能找到恰当译法。

戈宝权翻译最多的体裁是诗歌，他的诗歌翻译经验最丰富，感受也最多，所以他 1978 年曾说译事难，译诗更难，“高尔基写的《海燕》，翻译出来全文不过一千字，多年来虽然不断在进行修改，但要把它改译得更为完善，还待今后不断地努力”！1992 年撰《我译〈谢甫琴科诗集〉》，他道出心声：“翻译时，我尽力忠实于原文，本着形似和神似相结合的原则，不仅注重译诗的形式，而且注重诗歌的节奏和韵脚，用通俗而朴素的语言把它们表现出来，好让我们在阅读和朗诵时可以感觉到闻到乌克兰泥土的芳香。”

3.3 精益求精需更精

循着戈宝权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我们（黄忠廉 2013）不妨对戈译《海燕》再次精益求精，讨论汉译思想性的保留下的文学性缺失。

3.3.1 戈译诗意的缺失

曾几何时，学界认定《海燕》为散文诗而非诗。“我们读译文自然无法体味到原文的节奏感和音乐美。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海燕之歌》不是一首真正的诗。”（邵衍 1992）这是对戈译《海燕》诗意缺失的批评。认为《海燕》是散文诗的主要依据是它未用诗的格式分行来写，无韵。显然，这是按散文的形式划分的。诗是音乐性很强的文学形式，它与散文的不同之处，就形式而言，并不在于是否分行和押韵，而在于它更富有音乐性。

由表 1 可知，戈译保留了原诗的固定节数，共 16 节。但原诗的诗行数在戈译中基本上都变动了，更为严重的是原诗每个诗行的音步数在戈译中无规律可循，相应的音节数戈译也无规律可循。而这些从根本上破坏了原作文学性的固定属性，成了否定戈译的艺术因素。

表 1 原诗与戈译构成要素

诗 节	原文			戈译		
	诗行数	每行音步数	每行音节数	语片数	每片音顿	语片字数
1	5	4	8	5	无 规 律	7/7/8/8/6
2	4	4	8	5		9/12/4/12/7
3	4	4	8	5		6/10/6/10/11
4	4	4	8	5		13/3/8/11/7
5	4	4	8	4		7/7/12/13
6	5	4	8	6		4/16/8/3/5/11
7	4	4	8	6		6/4/7/7/6/6
8	8	4	8	7		4/11/5/2/11//12/15
9	4	4	8	5		5/3/6/8/9
10	5	4	8	8		2/4/4/12/4/5/6/8
11	4	4	8	7		7/8/7/3/7/2/4
2	1	4	8	2		4/4
13	7	4	8	9		4/5/6/6/12/7/7/8/6
14	1	4	8	2		3/7
15	4	4	8	5		7/7/5/5
16	1	4	8	1		11

说明：（1）“语片”“片”为语言片断的简称。戈译将原诗每个诗行译成字数不等的语言片断。（2）各语言片断的朗读停顿因人而异，所以每个语言片断所含的音顿数量不定。

戈宝权 1978 年本人也认识到：“通常都以为《海燕》是篇‘散文诗’，其实它的原文是有严整的格律的。”遗憾的是，他认识到了却未能做到。他译《海燕》之前，已有 5 个译本可资借鉴，戈译应是集大成，但在诗意表达上戈氏未能尽显原诗之美，以至于遭到批评：“翻译作品应当‘名从主人’，原文是诗歌则应称为诗歌，译文散文化是译文的缺陷而不应当以讹传讹。”（惊鸿 1985）

3.3.2 戈译诗行的缺失

诗节是诗的宏观结构，戈译在诗节上无变化。与其不同，《海燕》的早期译者瞿秋白就因为认为是诗，曾将原诗改为分行排列的诗体形式，而戈宝权还以原貌，拨乱反正，但在诗行上戈氏有所缺失。（见表 2）

表 2 原诗的诗行数在戈译中的变化

戈译语片与原诗诗行的数量关系	具体的诗节	总数
戈译的语片 > 原诗诗行	2; 3; 4; 6; 7; 9; 10; 11; 12; 13; 14; 15	12
戈译的语片 = 原诗诗行	1; 5; 16	3
戈译的语片 < 原诗诗行	8	1

从戈宝权（1978）多次修订看，他是力求全译原作，即从意义与形式上尽可能传达原作之美，照此应如数译出原诗的诗行，译文的语片大于或少于原诗诗行都不合适。可是由表2可知，戈译各诗节的语言片断多于原诗诗行者12个，相等者3个，少于者1个。戈氏正是从此开始失去原作的文学性，因为诗行是承载音步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且，汉译与原诗在诗行上的出入是汉译读者所不能知的，如实与否，全在译者尽责任了。

(1) Глупый пингвин робко прячет / тело жирное в утёсах — / Только гордый Буревестник / реет смело и свободно / над седым от пены морем!

戈译：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试译：胆怯而肥笨的企鹅，把身体藏进悬崖。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而自由地飞翔，翱翔在浪花飞溅的海上！

原诗节共5个诗行，戈译为6个语言片断，最长的16字，汉译显得松散，如果照原文不将主语独立，合为一体，“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崖底下”将长达20字；与之相反，戈宝权将由3个诗行构成的第2个语句分作4个语言片断，尤其是将 *смело* 和 *свободно* 分别独立成语言片断，成为肢解诗行的典型，与原诗节奏相悖。

3.3.3 戈译音步的缺失

俄语诗多用音节重音诗体写成，即每个诗行有一定数量的音节，且有一定数量的呈规律性分布的重音。音节重音诗的格律名称是音步名称决定的。一个重音音节与相邻的一个或几个非重音音节构成一个音步（*стопа*）。《海燕》原作每个诗行8音节，构成4音步，具体是扬抑格（*хорей*），即每个音步由两个音节组成，重音音节在前，非重音音节在后。

《海燕》总体上用四音步扬抑格写成，但某些音步也没有重音。例如：

(2) Над седой равниной моря ветер тучи собирает. Между тучами и морем гордо реет Буревестник, чёрной молнии подобный.

戈译：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象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试译：在那苍茫的大海上，海风攒聚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在高傲地飞翔，像那黑色的闪电。

原作第1诗节第1诗行有4个重音，第2、3、4、5诗行均含3个重音。由戈译可以发现，戈译基本传达了原作的节奏，用了汉语的三音顿以对原诗的四音步，这应成为全诗汉译的音顿基调，像四音步贯穿原诗一样贯穿汉译始终。

所谓“顿”，即“音顿”，又称音尺、音组、节拍等，是诗歌的节奏单元，由音节和音节的组合。汉语一字一音节，每个诗行中几个音节组合在一起即可形成顿，相当于音步。节奏的核心是等时性，各顿或音步等时排列。汉语的顿与俄语的音步还有不同，俄语的双音节扬抑格音步是重轻音节组合，而汉诗的顿所包含的音节可多可少，音节少时有的音节吟诵要拖长，音节多时有的音节则要缩短。顿的划分既考虑音节的整齐，又兼顾意义的完整，每顿含2—4个音节。现据之考察戈译之不足。例如：

(3) Всё мрачней и ниже тучи / опускаются над морем, / и поют, и рвутся волны / к высоте навстречу грому.

戈译：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唱歌，一边冲向高空，

去迎接那雷声。

试译：乌云变得越来越暗，直向海面垂逼下来，波浪歌唱着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隆隆的雷声。

原文第7诗节分4个诗行，戈译有6个语言片断，未能传达原文的节奏和气势。为了形成3个音顿，试译将 *Всё мрачней тучи* 独立为1个诗行，将 *ниже* 与 *опускаются над морем* 合为1个诗行；同时将 *навстречу грому* 独立为1个诗行，添加修饰语“隆隆的”以显其意义，更重要的是使之构成3个音顿，以对应原诗行的4个音步。

3.3.4 戈译节奏的缺失

原诗各诗节由1—3个诗句构成，每个诗节1—8个诗行，诗句与诗行既有一对一，更多的是一对多，如第3诗节第1诗句含1个诗行；第1诗节第1诗句含2个诗行；第1诗节第2诗句含3个诗行；第4诗节为1个诗句，含5个诗行。这种复杂关系若处理不当，必将影响全诗节奏的再现。惊鸿（1985）认为“戈宝权译文几经修改，语言精炼而含蓄，富有诗歌的意味，越来越接近原文。但仍不可能象原文那样讲究韵律，也不再象原文那样分行”。

其实问题并非在于分行，而在于区分有形的诗句和无形的诗行。诗行与诗句是两个概念，中国古典诗歌，诗行往往是一个完整的诗句，英语和俄语的几个诗行往往构成一个完整的诗句。聂珍钊认为诗行是诗歌的基本单位，韵律结构及韵律单位，是诗学术语；而诗句是诗歌的语法结构及语篇单位，是语法术语。因此，汉译时如果依旧照诗句译出，有可能破坏诗行，破坏原诗的内在节奏，最终破坏原作的文学性。例如：

(4) Гром грохочет. В пене гнева стонут волны, с ветром споря. Вот охватывает ветер стаи волн объятые крепким и бросает их с размаху в дикой злобе на утёсы, разбивая в пыль и брызги изумрудные громады.

戈译：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将它们摔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

试译：雷声轰响浪花溅，波涛汹涌与风争。看那狂风张开臂膀，卷起层层巨浪，用力向上一甩，狠狠地砸向悬崖，把这些巨大的翡翠，摔得雾一般的粉碎。

原文铿锵有力的节奏，戈译也循诗句而逐项对译，基本未考虑诗行的因素。周冰心（2008）借王力之语“中国人喜欢用四个字的短句子，以为这样可以使文章遒劲”认为戈译音韵上朗朗上口，节奏分明，如“雷声轰响”等。殊不知，这种节奏是汉语的节奏，而非原作的节奏，不仅要讲究双音的节奏，更应关注原作八音节四音步这一节奏的传达，虽说汉译求不得对等的四八节奏，但是可求三顿的节奏。试译则将“Гром грохочет. В пене гнева стонут волны, с ветром споря”中的意象切分，尤其是将 *В пене гнева стонут волны* 分为“浪花四溅”和“波涛汹涌”两个组合意象，分别与 *Гром грохочет* 和 *с ветром споря* 再次组配而成汉语的“雷声轰响浪花溅”和“波涛汹涌与风争”，双双呈现为“二二三”式节奏。

4 文学译介研究

戈宝权还是翻译与研究结合的典范。他从译近60年，始终不渝，文学翻译的同时他逐步涉及俄苏文学史研究和中外文学译介研究，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4.1 俄苏文学译介研究者

“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鲁迅语）戈宝权正是国内研究最接近这位“导师和朋友”及其后来者苏联文学的学者之一。戈宝权译介俄苏文学，又以俄罗斯古典文学为主，着重研究普希金、高尔基、托尔斯泰、爱伦堡、马雅可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

1948年写《苏联文学讲话》时，他就涉及了苏联文学翻译史。而1986年的《俄国文学和中国》是一篇代表作，对俄国文学翻译史的总结占了一半篇幅。文章开门见山，借鲁迅的话说明俄国文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据考，我国最早译介俄国文学始于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时间是1903年。1907—1910年先后译介了莱蒙托夫、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普希金、果戈理、迦尔洵、安特来夫等人的作品；民国初至五四运动前国内用文言翻译了上述等十几位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约80种以上，其中托尔斯泰作品近30种，均由日语和英语转译。五四运动后，俄国文学汉译大量涌现，多从俄文直接译入，除前述作家外，新添如下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柯罗连科、克雷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克鲁泡特金、贝宁等。随着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发展和高涨，苏联革命文学也不断译介过来，如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等人的作品，还译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列宁等人的文论著作，还从俄文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抗战以后，译介主体转向俄苏作家作品的结集出版。建国后，俄苏文学译介更是占据了重要地位，除继续译介其他作家作品和翻译苏联各民族的古代文学作品外，俄国古典文学多以单行本和选集出版，文论译作也大量面世。专门创办了译介和研究俄苏文学的专业期刊，如《苏联文学》《当代苏联文艺》《俄苏文学》等。

作家作品翻译史个案研究是其特有的研究领域，由篇名可见一斑：《普希金和中国》《马雅可夫斯基和中国》《屠格涅夫和中国文学》《托尔斯泰和中国》等。戈宝权研究最充分的是俄罗斯伟大诗人、俄国新文学奠基者、俄罗斯文学语言创始人普希金，从1947年《普希金文集》到1996年《普希金名作欣赏》，其间涉及普希金的著译至少有25篇（部、首）。1947年纪念普希金逝世110周年，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文集》，1954年修订再版，其中《普希金诗选》由戈宝权选译，盛誉国内，其译文广为采用。1950年代，他深入研究普希金，参观普希金博物馆，阅读普希金手稿和藏书，与苏俄研究普希金的专家交流，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代他对普希金的研究更深了一层。据他研究发现，1903年出版的由戢翼从日文转译的《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实为普希金著名小说《上尉的女儿》，是我国最早译成中文的俄国小说。尔后，被别林斯基喻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于人民性的作品”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先后在中国出现了近10个译本，戈宝权1990年比较分析了6个译本。戈宝权拥有其中现难以查到的翻译珍本，这6本成书时间和译本情况戈宝权都做了详细考究。

托尔斯泰也是戈宝权潜心研究的对象。在苏期间，他曾多次访问托氏故乡及其各地的博物馆、纪念馆等。他对托尔斯泰的崇敬之情由一件事可见一斑：1928—1958年出齐了91卷本《托尔斯泰全集》，戈宝权花几十年时间才收齐，虽经“文革”浩劫和1976年地震，他却一直保存了这份我国唯一完整的《托尔斯泰全集》原版，1986年献存于南京图书馆。戈宝权对高尔基的研究更是成绩斐然。戈宝权在红场亲见过他，后参加了高尔基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葬礼，是中国最早以亲身感受论及高尔基的开拓者。

4.2 东欧文学译介组织者

1959年，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成立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戈宝权就任组长。1962年初，苏东文学组分为苏联文学组和东欧文学组，他又任东欧组组长。

戈宝权一上任，就狠抓资料建设。发动集体和个人，尽一切可能收集国内外的东欧文学书籍，很快形成了国内东欧文学图书集中地。同时着力培养刚刚学成归来的年轻学人，定目标，订计划，旨在研究东欧文学的历史、理论和现状。戈宝权清楚，东欧文学以前多从英、俄、日语转译而来，因此他非常英明，认为大语种人多，有人埋头翻译，有人专心研究，而东欧室应该既会研究，也能翻译，当做多面手，结果培养了一批既会文章又会翻译的东欧文学专家。经他策划，每种国别文学两人合作，一人治历史，一人治现状；独自

一人者，以现状为主。仅 1980 年代初至 1995 年东欧室被撤的 10 余年，东欧室撰有《东欧当代文学史》、《东欧戏剧史》等 10 余部专著；翻译了《裴多菲诗选》等数十部古典和现代的诗歌与小说，计 2000 余万字；发表论文百余篇，拓展了外国文学研究的领域，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增进了与东欧各国的文化交流，因此多人获得外国政府颁发的奖章。

4.3 比较文学研究专家

1970 年代后期，他着重研究了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著有专著《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阿 Q 正传〉在国外》等，论文有《鲁迅和史沫特莱的革命友谊》《鲁迅和增田涉》、《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鲁迅和青木正儿》、《鲁迅和普实克》、《鲁迅和爱罗先珂》等。

中外文学关系在他眼中大致两种：一种是“在”或“对”的关系，着重于甲方在乙方的译介情况，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文学影响，是一种单向关系，如《明代中国伊索寓言史话》、《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法国文学在中国》、《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五四”运动前后俄罗斯古典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等；另一种是“和”或“与”的关系，以示二者的关系是联合的，互动的，交叉的，侧重于译介情况探源，彼此在文学上的作用与关注等，二者呈一种双向关系，如《泰戈尔和中国》、《俄国文学和中国》、《郭沫若与外国文学》、《高尔基和中国》、《契诃夫和中国》、《中外文学因缘》等。

戈宝权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有一定的范式，第一种范式是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大致包括：中国著名作家的外国文学修养、从译业绩及对文学翻译的认识、外国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对中国文学创作活动的影响、中国作家作品外译对世界文学宝库的贡献、中外作家交往等。先以《郭沫若与外国文学》为例。郭沫若中小学时代嗜好林译小说，后来又读严译名著。留学日本后，接触了泰戈尔、莎士比亚、雪莱、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间接接触了北欧、法国和俄国文学。1920 年代初至 1940 年代末，郭沫若共译了 10 个国家 60 多位作家诗人的 100 多种作品，发行 30 个单行本，字数过 300 万字。论及外国文学对其创作的影响，其诗作常提及西方文学、美术、音乐乃至哲学知识且不说，仅诗歌受影响的阶段就可分 3 期：第一期，五四前泰戈尔式，崇尚清淡简短；第二期，五四中惠特曼式，崇尚豪放粗暴；第三期，五四后歌德式，崇尚狂飙激情。郭沫若的翻译见解大致有：（1）于直译意译之外，译诗还有风韵译；（2）译文尽量流畅，力求忠原文；（3）达意之外，还应保留原作风貌；（4）文学翻译要有文学性；（5）译文学可激起创作欲，可学表现手法，改进本国语文；（6）信达雅很重要，也很完备；（7）翻译需要生活体验；（8）应培养翻译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

再以《茅盾与世界文学》为例。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有三：（1）从文学起步时就潜心研究外国文学，介绍外国文艺新潮，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茅盾等译了 25 个国家和民族的 50 多位作家的小说，10 个国家和民族的 12 位作家的戏剧。（2）他的作品先后被译成 20 多种语言出版，丰富了世界文学。国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和评述著作出现，涌现了一批茅盾研究专家。（3）茅盾还以世界著名作家的身份与外国作家交往，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增强了与各国人民的友谊。

第二种范式是外国文学（作家）与中国，大致涉及：追索译介史、最早译介的作家与作品、不同译本间的关系、翻译阶段及其作品数量与质量、译者研究、译品研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等。

戈宝权谙熟俄苏文学，与国内作家兼译家过从较密，因此他研究俄国古典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合适。比如，1991 年他曾就此撰文，认为本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夕译入的俄国文学作品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十几位俄国作家的作品 80 余种。五四运动后，俄国文学更广泛更多地介绍到中国来，如 1920 年出版了《俄

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1921年《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后来共学社编译了一套《俄罗斯文学丛书》，出版了散文、戏剧等方面的作品。1924—1926年间出版了《普希金小说集》《俄罗斯名著》第一集等。此时中国出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文学团体，其代表人物都热爱并译介过俄国古典文学作品，创作上受其影响，如鲁迅创作了与果戈理同名小说的《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结尾使人想起安特来夫《谩》的结尾“救救我吧，救命！”。又如写“小人物”，《孔乙己》《药》《祝福》均有俄国文学的踪迹。受俄苏文学影响的还有茅盾、瞿秋白、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耿济之等。

又如，他研究屠格涅夫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据考，屠格涅夫最早的译者是（刘）半农，他1915年在中华书局《中华小说界》第7期用文言从英文转译了《杜瑾纳夫名著》等；屠格涅夫作品译介有阶段性：（1）五四运动至1926年，译文主要见诸报刊，反映快，开始出单行本；（2）1927—36年，中长篇大量译出，1928年达8种之多；（3）1936—1949年，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系列推出《屠格涅夫选集》；（4）1949年至今，译作大量再现，含再版，新译重译更多，大受欢迎，多是单行本，也含戏剧、儿童文学，也有作家传记和研究论著，推动了屠格涅夫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

5 文化交流大使

戈宝权做过外交官，而他的文学翻译和文化交流则使他成了广义上的文化大使，他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5.1 依托文学传播文化

戈宝权大学时代就从译，本身就是充当了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后来职业的变迁，都离不开与外国文化打交道。自1935年起身为驻外记者，时刻都要为报刊采访写报道。建国前，他任中苏文化协会理事及该会编译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委员，任《中苏文化》编委。建国后，又受党和政府的重托，当了一名外交官，任中国驻苏使馆文化参赞。回国后，又任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曾参加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和许多国际文化友好活动，以及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俄苏文学、东欧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以及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

60多年来，令戈宝权最割舍不下的是他为之倾注了最宝贵年华的俄苏文学，他译介了一大批俄苏作家作品，为开阔中国文艺界视野、沟通中外文学关系、为中苏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表彰他在发展文艺科学和中苏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莫斯科大学委员会1987年3月20日作出决定，授予他“名誉博士”，5月20日苏联驻华大使馆隆重举行授予仪式，1988年他又被授予“苏联各国人民友谊勋章和普希金文学奖”。这一切，他都当之无愧。

无论是身为记者还是外交人员，是身为中苏友协的负责人还是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戈宝权常代表中国文化界或政府参加国内外一些文化交流的活动。他访问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出席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应邀到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讲学，该校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这是巴黎第八大学授予第一个外国学者的名誉博士学位。又如1935年11月22日，他应苏联作协之邀，随同苏联文化界和文艺界人士访问了托尔斯泰的故乡。1937年2月16日全苏普希金展览会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开幕，戈宝权把鲁迅主编的《译文》杂志普希金专号和普希金作品中译本赠给展览会陈列出来，很好地表达了中国文坛和中国人民对俄罗斯作家的热爱。同年，他还参加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访问了普希金的故乡；参加了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普希金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基村举行的社会活动，并为上海的《文学》月刊撰写纪念普希金逝世百年祭的长篇报道，为中国人民了解这位伟大的作家及时地提供了信息。1958年在塔什干他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之后，去塔吉克共和国参加了波斯和塔吉克

古典文学始祖鲁达基诞辰 1100 周年的纪念活动。1987 年，他又应邀参加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纪念普希金逝世 150 周年盛会，并再次访问了普希金的故乡。

研究俄国文学的同时，戈宝权还研究和翻译乌克兰文学，首选是乌克兰伟大人民诗人、乌克兰近代文学奠基人和文学语言创建人谢甫琴科的作品。1961 年为迎接谢甫琴科逝世 100 周年，他从俄文译了诗人的不少诗歌作品，1983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将他编译的《谢甫琴科诗选》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一，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乌克兰、加拿大、美国、西德等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88 年在谢甫琴科诞辰 175 周年前夕，戈宝权选译了 150 余首诗，成为我国第一本从乌克兰语译出的文学作品。鉴于戈宝权译介乌克兰文学的贡献，1988 年 8 月乌克兰作协主席团授予他伊万·弗兰科文学奖。1989 年 3—5 月期间戈宝权在谢甫琴科长眠的塔拉斯山的纪念博物馆接受了伊万·弗兰科文学奖，并应苏联作协和乌克兰作协的邀请，分别在莫斯科和基辅参加了纪念谢甫琴科诞辰 175 周年的纪念活动，并沿着第聂伯河追寻了诗人的足迹。

5.2 与国外作家有深交

文化交流的另一种途径，是他与国外作家的广泛交流和交往，通过文坛名人，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加深中外人民的友谊。比如，他与乌克兰作家协会的作家们交情笃深，翻译谢甫琴科诗歌时他受到了热情帮助，虚心听取了意见和建议，直接从乌克兰语翻译，避免了从俄语转译，有效地促进了两国作家间、最终是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戈宝权与外国作家交往的典型是他与俄罗斯作家爱伦堡的友情。1938—1945 年间，戈宝权不断地翻译了爱伦堡的通讯和政论文字，刊于《新华日报》、《抗战文艺》等报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不是战争的战争》、《6 月在顿河》、《英雄的斯大林城》等，均为报告文学。这些作品以现实生活中典型的真人真事为题材，经适当艺术加工，具有新闻特点的文学作品，为艰苦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增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增强了抗日军民战胜法西斯的信念。难怪这些译作受到了周恩来的称赞，周总理还为其编译出版的《6 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题写书名。为更好地译出这些作品，戈宝权与作者爱伦堡保持书信往来。1942 年 12 月 2 日作者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对我的关心和中国读者对我的著作的兴趣，使我非常高兴和触动着我的心。……你不难想象，我的书用中文出版，这对我将是怎样的一种快乐。我不了解你们这个美好的国家，但是你们多少年来的英勇斗争，鼓舞了所有拥护自由的人们！”他们神交多年，直至 1949 年才相见。那年 8—9 月，戈宝权参加全苏保卫和平大会，会间，他们多次相会。1949 年后戈宝权在中国驻苏使馆工作期间，常应邀作客。1951 年 9 月，爱伦堡访华，戈宝权在火车站为他送行。1954 年戈宝权离任回国前向他辞行，这是最后的一见。1983 年应邀参加国际苏联文学翻译家会议，去新圣母修道院墓地追念昔日的友人。

5.3 文化交流薪火承传

戈宝权不仅自己投身于文化交流，更有一颗热衷于文化传播的心，除在领导岗位上培育学术接班人外，他还在社会上培养后继力量。

1986 年他将数十年省吃俭用储得的 2 万余册藏书捐给家乡，为表彰这一义举，江苏省政府给他奖金，就在当年他就用这笔资金设立了“戈宝权文学翻译奖”，与韩素音青年翻译大赛齐名，以奖掖扶持年轻的翻译工作者。1986、1990、1994、1998、2001、2004 年在南京分别颁发了五届“戈宝权文学翻译奖”。1990 年，戈宝权的家乡江苏省东台市新建图书馆，命名为“戈宝权图书馆”。可惜的是，这一文学翻译奖后来应者寥寥，直至停办。

参考文献

[1]董史良. 翻译的思维问题[J]. 中国翻译, 1988(3).

- [2]戈宝权. 漫谈翻译问题[J]. 外国文学, 1983 (11).
- [3]戈宝权. 谈谈高尔基的《海燕》[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78 (4).
- [4]黄忠廉. 文学性:戈译《海燕》所失? [J]. 俄罗斯文艺, 2013 (1).
- [5]惊 鸿. 谈《海燕》的体裁及表现手法[J], 江苏教育, 1985 (1).
- [6]邵 衍. 《海燕之歌》文体辨释——兼议标题的翻译[J]. 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 (2).
- [7]周冰心. 高尔基《海燕》与中国现代语言文学——以瞿秋白、戈宝权的译文为例[J]. 俄罗斯文艺, 2008 (2).

A Review of Translator Ge Baoquan

Huang Zhong-lian

(Centr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Mr. Ge Baoquan was a famous translator in China as well as an expert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history, foreign literatures, sino-foreign literary relation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Having studied and translated foreign literatures for almost 60 years and published nearly 200 translations and works, he obtained dozens of honorary awards and won high reput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Keywords: translator; Ge Baoquan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译组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 15FYY0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学汉译生命气息研究”(13YJA740047)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项目《外语科研方法系列研究》(GWTP-GC-2015-01)资助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黄忠廉(1965—),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翻译学, 汉译语言。

收稿日期: 2016-06-27

[责任编辑: 惠秀梅]